

· 记者见闻 ·

温州柳市纪行

本刊记者 王碧蓉

上的丰盛、富足，另一方面又发现他们有一种小心翼翼、敏感多疑的防范心理。他们能热情地、慷慨地接待你，让你吃饱喝足，却很难向你袒露心扉。这恐怕正是改革时期受时局、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特

人们都说去温州太不方便，一是没有火车，二是没有飞机。其实，日益发展的汽车运输完全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尽管现在行驶的多是个体户的汽车，尽管乘汽车爬山越岭，免不了长途颠簸之苦。然而，你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都有车，不管白天黑夜，不管阴晴风雨。去温州，并不算困难。要不为什么来自温州的供销员、弹棉郎、补鞋匠、建筑工、木工等等能“满天飞”呢？

汽车从杭州出发，一路颠簸近12个小时，遇到交通事故堵车又占了不少时间。翻过了一座座山，车越往山里开，就越有一个奇怪的感觉，如此偏僻、似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怎么竟蹦出一个“温州模式”来？车过雁荡山，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块不大的平原，零散的田野上土黄色的稻草迎风摇曳，没有越冬作物，也没有想象中的麦苗、菜花，没有高大的厂房，也没有现代的高层建筑；有的是鳞次栉比的新建的民居，两层的、三层的甚至四层的；还有那一片白花花的新坟。……温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如想象的好，但这里又确实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试验区。

我们这次考察最感兴趣的是柳市——“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农村集镇，如今是全国闻名的五金低压电器产销专业市场。其发展之快，产值之大，收入之高，均居温州十大商品市场之首。在这里见到的干部，精明干练，满口经济术语，办事洒脱迅捷，其它地方触目可感的官僚气在这里很少见到。柳市，真是一个讲效率的世界，人们忙忙碌碌，街上少有闲人，对政策的反应极为敏感，格外地关注时局的稳定。我一方面看到他们物质生活

定心态，它向我们的决策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政策的稳定是改革成功的根本。

一个偶然的机，碰到了三个女孩，活活泼泼，蹦蹦跳跳，大的约九岁，两个小的六七岁。她们不像农村小孩那样害羞，大大方方，还居然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们逛过北京、上海、哈尔滨，见多识广。那个大点的孩子叫旭如，她告诉我：“我读小学五年级，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爸爸在很远很远的东北开电器商店，妈妈在家里照顾孩子，也开了一个电器门市部，平时放学回家帮妈妈做家务。今天妈妈给我们十元钱，让我们自己过星期天。阿姨，整天在家呆着很寂寞的。”我听了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小小的孩子怎么也会懂得寂寞？我问她：“寂寞是什么感觉？”她说：“寂寞就是自己在家，没有人说说话，做做游戏”。我想这孩子的感觉是很准确的。前几年，这里的许多家庭处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还让孩子们帮工，现在富了，不用孩子再帮工，大人们都忙于自己的实业，顾不上孩子们，从他们的腰包掏几块钱可以打发孩子过个星期天，但却使孩子们逐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我想，在柳市象旭如这样自己带着弟妹过星期天的孩子该有多少？这里，大多数家庭总有一个大人（父亲或母亲）长年在外跑供销、开商店，凭着温州人聪明灵活的商业头脑，把生意做得很兴隆。柳市的万元户已算不了什么，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已经开始出现，但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家庭观念淡化了，夫妻感情破裂导致家庭瓦解的也很多。小小的旭如也本能地感到家庭的危机，她不无忧郁地说：“爸爸老不想回家，两次妈妈催她回来，就

跟妈妈吵架。现在又快过年了，我盼望爸爸早点回来，可又害怕爸爸回来。”这种矛盾的心理背后折射出这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三个女孩玩得很开心，她们又是唱歌、又是扭迪斯科，只有在这时，她们的童心才真正得到了恢复。旭如十分真诚地邀请我到她家去玩，这种恳求我是不忍心拒绝的，顺便也很想见她母亲。

她们又蹦又跳在前面带路，我却被大街小巷的电子市场吸引住了。电器门市部一间连着一间，店内有柜，柜外有摊，真可谓一支“浩浩荡荡”的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大军。后来我了解到，光柳市镇就有1300来间电器门市部，上市的产品大到4000元一台的配电柜，小到二三分钱一颗的螺丝钉，产品品种多达2000多种，规格之齐全，连大城市也望尘莫及。而且，街上还有人专门出售《产品样本》和《产品目录》，为客商提供采购指南。因此，客商前来订货或购货，用不着“南征北战”，只要先买上一本目录，然后按图索骥，在街上转上几圈，就可大功告成。这就是柳市人擅于经营之道的表现，比起我们在京城触目可感的官商作风与经营方式，柳市人似乎更懂商品经济的规律。有意思的是，这些头脑活络的老板原来大都是胼手胝足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民，如今在他们身上，你还能找得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特征吗？“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式的农家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农民到“作坊老板”、商人的转化是如何完成的？为什么那些吃了几十年厂长、经理饭的人们倒不如这些“土包子”们会经营？这些问题常常萦绕于我的头脑中。

穿过数不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摊位，终于来到了旭如家。她家铺子有两个女雇工，看样子是从贫困山区招来的。她们在这里既是营业员，又是生产者；店铺既是门市部，又是仓库，“厂房”就是她们的住处。这使人想起工业文明初期的手工作坊，而正是在这简陋的环境和条件下，她们创造了比在土地上耕作要多得多的财富。旭如的母亲三十出头，但生活的磨难使她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丈夫整年不在家，她要照顾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还要在店铺当老板。她只是柳市许许多多独当一面挑起生活重负的“女强人”之一。

在墙上，我看到旭如得了许多奖状，也很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她妈妈说：“旭如在一个村小学读书，条件很差，集镇小学根本进不去，议价学生也收满了。我现在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哪个重点学校肯收她，出多少钱我都愿意，现在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啊。”她的想法可以代表这些刚刚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家长们的心愿。

第二天，旭如回村上学去了，我特意去看她的学校。其实村子离柳市镇不远，骑车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村也是电器产品市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搞电器生产，他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想赚钱，想发家致富，想出人头地，就得拼命干，就得熬夜，就得精打细算。这就是温州人的哲学。

村小学很容易找，在一条河的东面，在林立的农家新居中它显得那么简陋、寒酸。听校长讲这还是解放前的校舍。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墙之隔的富丽堂皇的庙宇。学生从窗口就可以看到那边鼎盛的香火和朝圣拜佛的场面。庙的对联上写着：“护国佑民圣德巍巍垂千古，赐福降祥神灵赫赫昭万年”。宁求虚幻的神灵护佑，而不从实实在在的教育事业中寻良方，这该是繁荣背后的多么深的悲哀？庙是刚建的，门前碑上刻着捐款人名字及捐款数，少则5元、10元，多则上千、上万。这个村还有一座光彩夺目、金碧辉煌耗资20余万的基督教堂，可容纳800多教徒，据说每到礼拜日，有上千的教徒涌入这座教堂。可惜我没有赶上这个场面。现在村的集体积累不再存在了，村民愿意集资修路、建庙，却没有想到为下一代的教育解囊。而家长们又个个望子成龙，有能耐的都把孩子送到镇、区、县级学校读书。看来这里还缺乏具有远大眼光的能人来牵头振兴教育。值得钦佩的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的那些坚持教学工作

波兰民主党代表团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这是民盟首次邀请外国政党代表团来访

应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的邀请，以波兰民主党副主席、波兰议会副议长玛列克·维乔莱克为团长的波兰民主党代表团，于4月19日至26日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民盟首次邀请外国政党代表团来访。代表团成员有：波兰民主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书记、首都委员会主席、议会议员耶·格鲁哈尔斯基，波兰民主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克拉科夫市委主席、克拉科夫矿业冶金学院院长、议会议员杨·阳科夫斯基，波兰民主党中央书记彼·弗朗科夫斯基，波兰外交部部长顾问、翻译波·萨克热夫斯基。

4月20日下午，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副主席钱伟长、高天、罗涵先、冯之浚会见了代表团全体同志，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党之间的友好交往进行了亲切的交谈。维乔莱克团长代表波兰民主党姆温查克主席邀请费孝通主席明年率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出席波兰民主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费孝通主席对此表示感谢。晚上，费孝通主席宴请了波兰民主党代表团。4月21日至24日，波兰贵宾由冯之浚副主席陪同，访问了广州、深圳，受到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民盟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欢迎。

4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分别会见了波兰贵宾，胡启立说，1986年赵紫阳同志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互访，揭开了中波友好关系新的一页。我们衷心祝贺中国民主同盟同波兰民主党建立友好工作关系，我们相信这种关系将有助于促进中波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晚上，胡启立、阎明复设宴款待了波兰贵宾。

26日下午，中国民主同盟和波兰民主党在钓鱼台国宾馆签订了1988—1990年往来议定书，钱伟长副主席、维乔莱克团长分别在议定书上签字。根据议定书，双方将派代表团互访，交换各自出版物，努力促进两国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的交流，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费孝通、高天、叶笃义、罗涵先、冯之浚，波兰驻我国公使衔参赞库希涅石，波兰民主党代表团全体同志出席了签字仪式。晚上，钱伟长副主席设便宴为波兰贵宾饯行。

(陆 玮)

的教师们，例如校长夫妇在这个村当教师就已有30年了，他俩一生中的华彩年代可以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们的女儿办了一个家庭幼儿园，让那些终日奔波于生意的父母们免除后顾之忧。热心并擅长于教育者若能同腰缠万贯者想到一块去，则后代幸甚！

抛荒的土地与繁荣的手工作坊，实业上的高效率、务实精神与精神上的无所凭依、不安全感，鼓囊囊的腰包与家庭的感情危机，寒碜的校舍与富丽的教堂、庙宇，……耳闻的、目睹的诸多现象，给我描绘出一个复杂、矛盾的柳市形

象。虽然如此，我却相信，尽管这里的发展似乎有点畸形，但这是由于我们过去欠债过多，如今百废待兴，经济必须领先，至于精神、生活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必将得到克服，它决不能成为倒退的理由。看来，温州人是不会也不愿倒退的，因为他们懂得“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能带来幸福，他们只有向认定的现代化方向义无反顾地奔去，并逐步完善自身，才能有真正的发达可言。我想这不必苛求，改革中所暴露的问题只能由改革自身去解决。